论民国女性词的发展流变
——以民国女性词集为中心

徐燕婷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摘　要: 以民国女性词集为中心来观照民国女性词,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词集刊刻数量上看,中期时间短,词集刊刻数量多,前期和后期时间相对长,词集刊刻数量少,间接反映了女性词创作在民国由低谷到高潮继而衰退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女性词发展流变观之,第一个阶段,1912 年至 1927 年国民政府成立前,词集作者主要为官宦女子,词作集中表现为晚清闺秀词余风的笼罩与突围。第二个阶段,1927 年至 1937 年抗战爆发,词集作者主体以职业女性为主,词作集中表现在新学教育背景中词的因循与新变。第三阶段,1937 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词作呈现明显的两极走向:一类女性词彻底回归传统,另一类女性词则向现代词转型。在这整个发展流变过程中,又贯穿着民国女性词对特殊的历史阶段与特定的社会政治时局的观照和书写。同时,女性词由词人纯任性灵的书写逐渐过渡到有一定词学理论指导的有为而作。

关键词: 民国词;女性词;词集;发展;流变
中图分类号:I 207. 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4-0067-07

继清词中兴后,词在民国与新文学的对冲中,依然留有一席之地,于民国女性词亦然。这一现状显著的表征是数量众多的女性词集的刊刻。据笔者对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数家大型公共图书馆、国内 20 余所高校图书馆及哈佛燕京图书馆等海外部分图书馆的查询,目前已知存世的民国女性词集就有近七十种。通过对这些词集的爬梳①,再结合词集的刊刻时间和词作所呈现的词风,我们大致可把民国女性词创作分为三个阶段:1912 年至 1927 年国民政府成立,为民国女性词创作的低谷期,主要表现为晚清闺秀词余风的笼罩与突围,这十五年间共 16 部词集问世,包括许禧身《亭秋馆词钞四卷》、郭坚忍《延秋馆词》等;1927 年至 1937 年抗战爆发,是民国女性词创作的兴盛期,主要表现为在新学教育背景下女性词创作的因循与新变,这十年间词集 31 部,包括罗庄《初日楼续稿》、陈翠娜《翠楼吟草(含绿梦词续一卷)》、吕碧城《信芳词》、《晓珠词》、张默君《红树白云山馆词草》等;1937 年至 1949 年是民国女性词创作的衰退期,同时也形成了抗战后词坛的两极走向,一部分词创作实现现代转型,一部分词创作复归清末传统闺秀词一路,十二年间词集刊刻为 12 部(含一种合集),包括徐自华《秋心楼诗词》、汤国梨《影观诗词稿》、茅于美《夜珠词》、沈祖棻《涉江词》、李久芸《玉露词》等。如果把以上三个阶段分为前中后三期的话,则呈现出中期时间短,词集刊刻数量多,年均刊刻词集三部。前期和后期时间相对长,词集刊刻数量少,年均刊刻词集约一部。同时在这细分的每个阶段,词作皆是守旧与创新并存,只是每一阶段都有一种主导风

收稿日期:2018-09-16
作者简介:徐燕婷,女,浙江杭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近代社会转型与民国女性词研究》(项目编号:2017BWY009)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以民国女性词集为中心进行考察,这些词集指初次结集或出版时间在 1912—1949 年之间,且作者于民国年间尚存世的所有别集、总集等,包括所有排印本、石印本、油印本、稿本、抄本等。考虑到词集创作与出版存在一定时间差等因素,本文主要以词集中创作于民国时期的词作为重点观照对象。

尚,简言之,前期以传统为主、中期以新变为尚、后期则表现为明显的两极走向。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词创作和词集刊刻在民国由低谷到高潮继而衰退的发展变化过程。

一、民国女性词创作低谷期与晚清闺秀词余风的笼罩与突围

根据上文统计出的民国女性词集刊刻情况,民国成立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夕,女性词创作数量不多,处于一个低谷期,为民国女性词发展的第一阶段(1912—1927)。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因为政治原因带来的社会环境的剧变造成了女性词创作的衰退。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中国历史随之又经历了一系列政坛风云,“中华民国”成立,二次革命,护国运动,袁世凯复辟失败,张勋复辟失败,护法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等等,无一不伴随着历史的腥风血雨,在这动荡的社会、剧变的政治格局中,尽管外界环境的改变于女词人而言,仅作为一个客观的背景存在,她们的作品大部分是直抒性灵之作,无关乎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然而,根植于社会土壤的文学创作又不能完全疏离于社会大背景,女性原有的相对稳定安逸的环境被打破,惯有的吟咏自适难以直面惨痛的社会现实,故女性词创作较少,部分女性甚至选择搁笔。二是新文化运动分流了部分作者。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又是一场文学革新运动,吸引了当时一大批青年,该运动将古典文化列入需要革新的行列,词作为传统的文学样式,显然与运动的宗旨相悖。在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中,一些新青年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写作新体诗,在这些作者中,部分即是从传统的诗词创作转向新体诗的创作,所以于词体创作而言,流失了部分作者,产出亦相应减少。三是由于国学的短暂衰落使得词体创作及词集刊刻也进入到一个低谷期。民国政府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不仅废止了经科,1920 年秋季起,学校要逐步从文言文讲授过渡到白话文讲授,所以在此背景下,尽管 1917 年吴梅在北京大学开设词曲课程,总体而言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是词学创作的低谷期。二十年代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词学教授与创作逐渐回归,然而尚未迎来创作的高潮。同时,创作与刊刻又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故这一时期的词集出版不仅因为风云变幻的局势和战争使得出版业低迷,还因为这种教育与创作带来的滞后效应使得词集刊刻真正的高潮出现在 1927 年之后。

这一时期的词风主要承绪了晚清闺秀词的余风。词集作者以遗老型闺秀为主,她们主要出生于 19 世纪中下叶,很多词人如许禧身、温倩华、周演巽等在 1927 年前就已经谢世。这些词集作者自小所受到的教育大部分仍是传统儒家伦理教育,她们更多的是以一种传统闺秀的面目示人,尤多官宦女子。从已知词集的十七名作者来看,其中许禧身、左又宜、刘鉴、姚倩、姚茝、杨延年、何桂珍等七名为官宦女子,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得她们能够在针黹之余有闲暇从事文学创作。如刘鉴出身名门,为曾国藩侄曾纪官室,“内外两家极贵显”①其《分绿窗词钞》收词五十九阕,从内容来看,一类如《东风第一枝·送春》《风蝶令·暮春》等为伤春悲秋的抒怀之作,另一类较多的是题画词。总的来说,《分绿窗词钞》的题材内容比较单一、狭隘,更多的是闲暇之际的吟风弄月。如《水调歌头·壬子中秋步苏文忠韵》“桂飘香,桐漾碧,伴迟眠。笑看宇内,云开又捧一轮圆”等句,从内容和艺术层面来看并无创新。总体而言,这与晚清闺秀词是一脉相承的,以女性情感经验为主体的话语权导向为基础,呈现传统婉约一路的词学风貌,难以与晚清闺秀词词风截然区别。其他如温倩华、罗庄、周演巽等人,她们不是官宦女子,教育及游历等经历也已向现代女性接近,但在词创作上仍接近遗老型闺秀词风。如温倩华《清平乐·春晓》:“晓莺啼暖。睡起肢腰软。天气困人春不管。一味做成春懒。　　绿云双绾垂鸦。镜中自惜荣华。昨夜东风犹劲,开帘飞进桃花。”②词中

---

① 刘鉴:《分绿窗诗钞》叙, 1914 年长沙友善书局排印本。

② 温倩华:《黛吟楼词稿》,《黛吟楼遗稿》, 1921 年铅印本。

描绘了一种悠闲疏慵的生活情态,并流露出自惜年华之意和隐约的惆怅,类似的词作构成了温倩华《黛吟楼词稿》的主基调。这些词作置诸晚清闺秀集中,实难辨一二。

同时,随着清王朝的覆亡,民国新时代的开启,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一股新思潮在社会各阶层涌动。时风所及,一批女性开始走出闺阁,有了较广的社会接触面,并呈现出从传统闺秀向新女性蜕变的特质,尽管这类女性在此期仍属凤毛麟角,主要以张汝钊为代表,但已可看到这些女性变革词风的努力,逐渐撕开晚清闺秀词的余风笼罩,为迎接下一阶段高潮的到来作铺垫。这些词人主要的成长期和求学期已在 1900 年以后,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女界而言,“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女子团体的大规模出现,使中国女界前所未有地感觉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国家责任感,并积极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中去,在从军和参政两个方面,都做出了不亚于须眉男子的杰出贡献。”①于文学而言,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令文学的新与旧产生了直接的对撞,留守,或前行,成了必须得面临的抉择。所以,身处此时代洪流中,一些接受新学濡染的女性词集作者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新形势下国学式微的趋势,另一方面努力进行词学创作以保存国粹。这些女性开始自谋职业以求自立,开始在社会报纸杂志等刊发作品,这种由传统闺秀向现代新女性的蜕变反映在词集中,她们的作品呈现出更多样的生活内容,更丰厚的人生底蕴,更饱满的创作热情。如张汝钊《绿天簃词集》中很多作品已突破了传统闺秀词的余风,较少闺阁绮丽哀怨之作,代之以一种开阔和博大的内蕴之作。张汝钊曾云,“予生长名门,自十五岁被逼嫁某氏,后飘零四方,贫困潦倒,艰苦备尝,绮罗积习扫除尽矣。”②如《荆州亭·伤怀》:“窗外雨声如泣。枕上泪痕沾湿。落拓客途中,身类残花病蝶。　数点晚鸦落日。几处沙鸥争食。救国待何时。欲渡中流无楫。”③词作情景结合,在伤怀客途落拓、身体抱恙之余,词人更伤感于救国无路,身世感怀与济世情怀兼容。张汝钊的作品以写景、咏物、拟古、咏史、唱酬、怀思之作为多,显露出现代女词人眼界的宽度和深度。而这些创作,为下一阶段的到来做了些许尝试。

二、民国女性词创作兴盛期与新学教育背景下的因循与新变

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女性词集刊刻数量远超此前十数年,属于民国女性词创作的兴盛期,为民国女性词发展的第二阶段(1927—1937)。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从形式上统一了四分五裂的中国,所以 1927 年至 1937 年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思想领域相对宽松,文学创作开始活跃,对于出版业而言,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和发展的契机,此期结集出版的书籍较多。其二,20 世纪 30 年代是词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不仅词坛大家辈出,词社活动频繁,也产出大量的作品,专门的词学刊物《词学季刊》亦于 1933 年创刊,为词人创作提供了互相切磋与交流的平台,并专门辟有“近代女子词录”专栏发表女性作品,收录了吕碧城、丁宁、陈家庆、汤国梨、罗庄等 21 位女词人词作。很多女词人在此平台发表的作品后便收录于其出版的词集中,创作的高潮必然带来结集出版的高潮。其三,随着男女平权呼声的日渐高涨,女性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在此风气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接受教育,其中更有部分女性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无疑对于提升女性的知识储备具有直接的影响。且二三十年代尤其是 1927 年后,很多高校开设词学课程,吴梅、汪东、龙榆生、夏承焘、王易、卢前等南北各大学的知名教授讲授该课程,因此,女性得以在词学创作和理论学习方面得到系统指导。如陈家庆,1923 年进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受业于名师李审言、刘毓盘。据陈家庆《祭刘子庚先生文》可知,其跟随刘

① 鲍家麟等:《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0 页。
② 张汝钊:《归故乡后作》“王孙贫饿复谁哀”句小序,《绿天簃诗词集》, 1925 年铅印本。
③ 张汝钊:《绿天簃诗词集》,1925 年铅印本。

毓盘学词长达三年,“诲人不倦,发蔽祛疑。程门立雪,三载于兹。”①1928 年,陈家庆转学至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授业于吴梅门下。刘、吴二师不仅有深厚的词学理论,本身亦着力于词创作,理论与创作兼行,教学过程中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常常对学生的习作进行指导。所以刘、吴二师既是陈家庆学词之路的领路人,又对她的词体创作起着重要的影响。而在良好的词学教育环境下,女性学词群体、创作群体相较前阶段的扩大,也是这一期词集词作问世较多的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民国女性词以新变为尚。一方面,词集作者的身份构成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由第一阶段以官宦女子为主的传统闺秀而变为以职业女性为主,占据半数以上,尤多教育工作者。从该阶段已知的 26 名词集作者中,陈翠娜、马汝邺、王运新、周韫玉、吕碧城、孙景谢、陈乃文、卢葆华、姚倚云、陈家庆、丁宁、吕景蕙、王兰馨、张默君、姚楚英、吕惠如等 16 名女性为职业女性。除去吕景蕙、吕惠如等少数几个 20 年代即已过世的,这些女性大部分接受过新学教育,又活跃于社会,致力于女学,她们本身由于经历所致具有较开明的识见,可视为进步女性,与传统的闺秀词人已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在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进程中,尤其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进行创作的逐渐推广,由于词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学方式难以在西方世界找到对应的文体,故其西化的影响相对较小,仍在其既有的轨道上前行,同时又不可避免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冲击,逐渐发生裂变,并与新时代接轨。尤其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词学繁盛的局面出现,以 1933 年专业性词学刊物《词学季刊》的创刊为突出标志,一大批词社纷纷涌现,一大批词作在报纸、杂志等公共出版物发表。继之以晚清民初四大家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的相继谢世,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为代表的新式词学家逐渐走上舞台,开始引领三四十年代的词坛,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基于以上背景,随着女性经历的丰富、学识的提升所带来的思想的创新、眼界的开拓,女性词在词境上有较大的拓展,不再限于伤春悲秋的闺情、闺思之作,在继前一阶段清末闺秀词余风的突围中继续前行,融入很多新质的内容,并成为一种常态。“这些女词人与前代相比,除了才艺相埒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即她们大多是进步的时代新女性,一反前代春女、闺怨、艺妓式的女词人面目。”②男女平权意识在词中常有流露,如马汝邺“劝君珍重毋多愁。请看女辈峥嵘第一流。”(《虞美人·送孟清寰女士之奉天》)而随着民国初年开始的留学潮的出现,一大批知识女性迈出国门,开眼看世界,如吕碧城、吕美荪姐妹、周修辉、姚楚英等人,与此相应,一批海外词的产生也从一定程度上革新了民国女性词的创作,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事物与词这一传统的文学样式有机结合,别辟蹊径。如吕碧城《玲珑玉·阿尔伯士雪山游者多乘雪橇飞越高山,其疾如风,雅戏也》“羞拟临波步弱,任长空奔电,恣汝纵横。峥嵘。诧瑶峰、时自送迎”③等句,将阿尔卑斯雪山用雪橇滑雪事融入词这一传统体裁,以旧学之根柢,融于欧美之新事物,浑融无迹,一新耳目。另外,随着社会发展,新事物的出现,女词人的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词汇、新的意象,等等。所有这些,都成就了这一时期女性词的新变特质。于词境而言,小我情感、家国情怀、思乡情绪、海外新见等等,无意不入词,较前一阶段大大拓展,格局始而为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个别词人的作品已有明显向新诗过渡的痕迹,尤以卢葆华《相思词》为代表。卢葆华自小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及长,先后于女子师范学堂、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上海艺术大学等校求学,获得较好的教育。其时新文学创作成风,卢葆华亦在新文学创作领域成果颇丰,而这也影响到她的旧体诗词创作,两者间出现混融的趋势。如她的作品《青衫湿·秋悔》“秋风两地吹人老,同戴奈何天！卿卿我我,愁都有分,福却无缘。　　南朝剩粉,西冷残月,一样堪怜！聪明已误,多情应悔,莫再缠绵!”已呈现出明显的白话倾向,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词体

① 陈家庆:《祭刘子庚先生文》,《碧湘阁集》,1933 年铅印本。

② 曹辛华:《论民国词的新变及其文化意义》,《江海学刊》2008 年第 4 期。

③ 吕碧城:《晓珠词》卷二,1937 年铅印本。

创作在三十年代的词坛具有积极意义,也为传统词的演进指明了一条革新之路,可以说,这在传统词向现代词的过渡中,是一种先锋式的尝试。

当然,在注意到这一阶段女性词新变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其中对于传统的因循。这种因循一方面表现在作品本身,尽管这一时期大部分词集都或多或少表现出新变的特质,并构成了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但这些新变的尝试无法构架整部词集,它们仅是词集中的某种存在,某种探索。事实上,这些词集中的很多词作仍保留了传统词的特征。另一方面,这种因循也体现在词集作者本身。尽管这一时期大部分的词集作者都有意地进行新变的尝试,但这也并不意味传统派的彻底绝迹。事实上,由于家庭出身不同、个人对词体创作认识的差异和受教差异等原因,也仍还存在着一些固守传统词创作的女性,尽管不构成主流,却也不能忽视。比较突出的如姚倚云,她致力于女教二三十年,提出“女子教育,贵能观于今而慎所当取,尤贵能鉴于古而知所当守。”①而体现在词体创作中,主要为酬唱赠答和遣怀之作,几无新时代的痕迹。

三、民国女性词创作衰退期与抗战后词坛的两极走向

抗战全面爆发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阶段为民国女性词创作的衰退期,可视为民国女性词发展的第三阶段(1937—1949)。形成原因有三:一方面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抗日救亡成为国内的主旋律,要眇宜修的词体在国难当头之际作为抒发情怀的主要载体已不合时宜,难以如新文学般发出高亢激昂的声音。另一方面,在炮火纷飞中,沿海高校纷纷内迁,很多词社成员风流云散,原先词学的核心区域江浙沪、京津地区已难以还复往昔的创作盛况。在颠沛流离中,很多女词人困于生计无暇创作。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又开始,政治的黑暗与高压也使得词的创作陷入低迷。再则,很多出版机构因战火受到毁坏。所有这些,使得无论是词人的创作还是词集的刊刻皆数量有限。

这一时期女性词呈现明显的两极走向。一方面,抗战全面爆发,词学繁盛局面终结,在这极端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些词作呈现出一派祥和静谧之态,这些词集作者主要为传统的相夫教子型闺秀,她们的创作彻底回归传统。以潘静淑《绿草集》和李久芸《玉露词》为突出代表,伤春悲秋,相思离别,完全疏离于社会时事,坚守小我情感的书写方式。如李久芸《玉露词》,词境相对单一,作品不离伤春悲秋和相思离别。如《浣溪沙·寄秀敏两儿》:“鸦噪寒林破晓眠,梦中情味总茫然。沉思往事淡于烟。秋水溶溶帆带雨,碧云渺渺草连天。人间何处话团栾?”②因亲人离别而生出绵绵之思念,作品情思婉转,词风清丽,然在意境甚或词艺上并不能明显看出新变之内容。但值得肯定的是,在烽烟四起的年代,当许多词人迫于时局和生计放下手中之笔,意兴阑珊之际,李久芸“能从容艺苑,乐以忘忧;格益工,境益 ”③,尤可见其中之不易,这在小词创作相对凋零的四十年代颇为难得。另如何振岱女弟子王德愔、刘蘅、何曦、薛念娟、张苏铮、施秉庄、叶可羲、王真等人,虽她们中的部分人已属职业女性,如薛念娟为中学教员。然她们词集中更多的是对传统的复归,她们坚守旧文学的创作,酬唱应答,吟咏自适,在 20 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时代里,她们用传统女性词固有的形态,“旁若无人”地书写着她们的“平静人生”。

另一方面,虽然这一时期无论是词作数量还是词集刊刻数量都较前一阶段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然亦出现了新的气象,在延续前阶段女性词新变一路的基础上,此期的女性词进一步发展,基本完成向现代词的转型,并为最终跃进到当代词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以茅于美《夜珠词》和沈祖棻《涉江词》为突出代表。这些词集作者在民国成立之际或更晚出生,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词学最

① 顾公毅:《沧海归来集》序,1943 年铅印本。
② 李久芸:《玉露词》序,1949 年成都播文印书局铅印本。
③ 杨润六:《玉露词》序,1949 年成都播文印书局铅印本。

繁盛的时代完成文学教育,她们不仅能进行传统的文学创作,又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新学教育的濡染,也能在新文学创作中游刃有余。所以,确切地说,她们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女词人。这些女性词的主要特征是形式内容的进一步现代化。一方面,承续上一阶段海外新词的特色,茅于美等人词中继续将海外的所见所感等现代生活内容融入词中,给予词新的生活气息。如茅于美《海贝词》中创作于四十年代的作品《满江红·圣路易城大雪,思念家国,有寄》“风俗易,新习了。将旧梦,生疏掉”、《蝶恋花·余在华盛顿大学研究院攻读英国文学。圣路易城冬日大雪,城中雪景奇丽,如广寒宫内琼瑶世界也》“忘却羁愁居异国,万象生辉,伴我人幽独。何必广寒宫内宿。人间此境难重续”等,皆是有意识的尝试。然更主要的是词中中西文化的融合变成一种自觉的创作实践。如其《夜珠词》中《鹊桥仙》“红灯影里,欢情场上,偏有寸心如锁。但知无计拨神弓,一箭地千逃万躲”,化用西方丘比特之箭之典,又如《菩萨蛮》“楼阁称玲珑,金栏隐约红”句,作者自注“用英国十九世纪诗人但丁·罗色蒂《幸福的女郎》诗意。”①茅于美精通外文,受西方文学影响较深,她竭力寻求旧词体与新生活、新情思、新文学尤其是中西文化的融合。缪钺曾评价云:“今茅君以旧词体歌咏新事物,发抒新情思,而犹能大体不失长短句固有之风味,斯亦可以观矣。”②另一方面,词的现代化也体现在对社会民生的密切关照上。如沈祖棻词,跳出小我情感,拒绝绮语,与时代呼应,接轨现实,观照国家社会和民族的未来。其大部分词作皆是“有为而作”,不仅是其个人流亡岁月的记录,备尝艰辛的心路历程的承载,更是抗战史实的反映,忧虑时局、关心民瘼,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如《八声甘州》词前小序记载了其因战事日紧,离开屯溪一路辗转流寓到巴蜀的经历,词上阕“记当时,烽映绛帷红,弦歌杂军声。更压城胡骑,连营戍角,难觅归程。乱鹢殒星如雨,九死换馀生。征棹寒江夜,同赋飘零。”将战乱中的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以回忆的形式呈现,记录了那段胆战心惊的流亡岁月。其他作品即便是未有明确时事指向的伤离伤别之作,也真实地记录了乱世中人民的忧惧、哀伤,对重返家园的渴望和对和平生活的期盼。即使是作品中流露较多的愁情,也与前阶段有了完全不同的解读,笔触已不再局限于相思怀春,而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她的词作不见“绮语”,是“诗有史,词亦有史”的宏大叙事,深隐含蓄。

综上,第三阶段女性词从量上而言虽为数不多,但却是整个民国女性词发展的重要一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复归传统一路的女性词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终因格局过小而最终式微,而此期立足于传统词创作,并努力革新词体,结合社会民生、时代特色的尝试,不仅适应了新的时代,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女性词创作的新范式,并为最终跃进到当代女性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五、结　语

随着 20 世纪上半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对社会的影响,与女性从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向新学教育的变革,从内言不出的传统闺秀逐渐完成职业化的转型等相适应的是,在女性词创作领域,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民国女性词承续晚清闺秀词的余风,一方面积极与时代融合,创新词体特质,一方面又具有固守的一面,表现出对传统闺秀词的坚守,这种多元并存的局面也造就了民国词的复杂性。

在这个发展流变过程中,又贯穿着民国女性词对特殊的历史阶段与特定的社会政治时局的观照和写作。无论是女性词创作的低谷期、兴盛期抑或是衰退期,不管是坚守闺秀词传统,在伤春悲秋的圈子里书写个人情怀,还是紧跟新文化、新风尚,进行大胆的尝试与革新,民国女性词创作在整体上除受到词人性情、才气、际遇等影响之外,总体表现出更宽广的承载容量和对社会时事的关注,而不再普遍局限于闺阁生活一隅。这固然与民国女词人立言意识逐渐加强、女性职业化进程

① 茅于美:《夜珠词》,《茅于美词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1 页。

② 缪钺:《茅于美词集》序,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逐渐加快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①更是新的时代思潮、时代风气不可避免地烙印在民国女性身上的结果。

同时,在民国女性词发展流变过程中,女性词由词人纯任性灵的书写逐渐过渡到有一定词学理论指导的有为而作,这主要得益于新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型女词人。比如陈家庆为词深受刘毓盘、吴梅两位老师的影响,在创作中,重视词的寄托和雅正,强调立意、意境与音律的融合。又如沈祖棻,她的创作得到汪东、吴梅的指导,后她在指导正声诗词社的创作时,提出了明确的创作主张,她强调词要学北宋,不要过于雕饰,要流畅自然。女性词人对创作理论的关注、研究和实践,为民国女性词的创作开辟了一条专业化的路子,在闺阁吟咏特有的细腻与风致之外,在词作内蕴、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了明显不同于前代的开拓,也逐渐与男性词坛接轨,共同为迎接词学创作新的阶段做好铺垫。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Female *Ci*-poetry in the Earlier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Xu Yant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Observed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female *Ci*-poems from the earlier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民国词), their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The first stage covered the period from 1912 to 1927. During this period, the female *Ci*-poems were mainly written by women from officials' families, following the literary style of the female *Ci*-poems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second stagecovered the period from 1927 to 1937. During this period, the female *Ci*-poets were mainly professional women, who showed the combin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background of new-style educationin their writings.The third stage covered the period from 1937 to 1949.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arallel exist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to modern *Ci*-poetry and the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creation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female *Ci*-poems. Du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female *Ci*-poets' creation showed a significant polarization. On the one hand, some of the *Ci*-poem collections presented a peaceful and quiet atmosphere, and completely returned to the traditional way of cre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reation of female *Ci*-poems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the arbitrary writing based on the emotions of a Ci-poet to the conscious writing guided by some poetic theories.

Key words: *Ci*-poetryinthe earlier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民国词), female *Ci*-poem, collection of *Ci*-poems, development, evolution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详见笔者《民国女性词文化生态中的“传统范式”及其新变》,《福建论坛》2016年第3期。